

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国际化的由来与发展*

张 玉 友

内容提要 少数民族国际化问题是国家政治治理的重要议题。摩洛哥的柏柏尔问题源于法国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政策。摩洛哥独立后,受国内政治局势影响,柏柏尔问题逐渐政治化。20世纪70年代,作为摩洛哥内政议题的柏柏尔问题,开始出现国际化转向。20世纪90年代起,在泛柏柏尔主义、国际柏柏尔组织、柏柏尔流散群体及欧洲柏柏尔运动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摩洛哥柏柏尔问题逐步完成了国际化进程。随着2011年“2·20”运动爆发,摩洛哥柏柏尔运动的国际化滋生了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等导致地区不稳定的因素。对此,摩洛哥政府采取了积极介入与吸收政策的“柔性管控”策略,以减轻柏柏尔问题国际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摩洛哥 柏柏尔问题 少数民族治理 流散者

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国际化,泛指作为国内议题的柏柏尔运动扩散到国际上的现象,其经历了国内发展、海外流散者扩展和国际化形成等阶段。20世纪70—90年代,摩洛哥柏柏尔运动经历了从国内到国际的扩散过程,柏柏尔问题首次登上国际舞台。进入21世纪,摩洛哥柏柏尔流散者逐渐初具规模,并通过大大小小的民间社会组织影响摩洛哥政府的柏柏尔政策。阿拉伯剧变发生后,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倒台以及2012年马里战争的爆发,导致了马格里布—萨勒赫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作为柏柏尔人分支的图阿雷格人发起了自治运动,这深刻影响着摩洛哥及北非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鉴此,本文拟以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国际化现象为分析对象,探讨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国际化发展以及未来动态等问题。

一、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由来及演变

柏柏尔人^①主要分布于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约占摩洛哥人口的40%^②、阿尔及利亚人口的20%—25%、利比亚人口的8%—9%和突尼斯人口的1%。^③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由来及演变进程与法国的殖民政策以及独立后复杂的政治局势息息相关。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始于20世纪初,法国

* 本文是第66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19M663806)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欧洲的伊斯兰组织与运动研究——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例”(项目编号:2015ZX043)的研究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老师和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作为族群概念的柏柏尔人最早出现于中世纪早期阿拉伯史学家的征服编年史中。14世纪,阿拉伯史家伊本·赫勒敦在巨著《阿拉伯人、外国人、柏柏尔人的历史纲要和殷鉴》中系统地描述了柏柏尔人起源、世系与部落情况。19世纪,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后,系统发展了作为民族概念的柏柏尔人。马格里布各国独立后,尽管柏柏尔民族主义者以阿马齐格(Amazigh)代替柏柏尔一词,但法国学者发展的民族历史与内涵仍被继续采纳。

② 这里的40%人口主要包括居住在里夫地区和阿特拉斯山区的柏柏尔人以及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混血柏柏人。摩洛哥官方一般将阿拉伯—柏柏尔人放在一起统计,约占全国人口的99.1%。

③ Michael Brett and Elizabeth Fentress, *The Berbers*, Oxford: Blackwell, 1996, pp. 276—277.

为推行殖民统治,开始对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柏柏尔人在这一过程中“被发展”出了诸多“民族特性”。^①

传统上,摩洛哥柏柏尔人多居住在偏远的山区和沙漠地带,由于长期的部落形态,且离中央政府较远,故而被法国殖民学者称为“未开化之地”(Bled al-Siba),而中央政府统治的地区则被称为“政府之地”(Bled al-Makhzan)。法国殖民政府通过对摩洛哥地区的“未开化之地”进行现代化改革,建立由本土柏柏尔人构成的军队、行政机构、法院以及法语—柏柏尔语学校等,从而将其变为独立于“政府之地”的小殖民国家。^②但是,法国殖民政府的扶植政策并未让柏柏尔地区繁荣起来,相反不仅在经济掠夺政策下加大了该地区的贫富差距,而且在分而治之政策下制造了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的族群矛盾,让本就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边缘的柏柏尔人处境更趋恶化。

1930年5月16日,法国发布“柏柏尔法令”(由苏丹签署的行政令,具有法律效应),该法令通常被视作导致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以及独立后柏柏尔人与中央政府爆发冲突的主要原因,^③因为该法令事实上将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居住地区分割开来,这激怒了摩洛哥的民族主义精英。^④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该国政治权力主要由代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独立党把持,位于阿特拉斯和里夫山区的柏柏尔人继续以乡村部落社会组织的形式存在,政治参与度极低。^⑤独立后5年里,由于独立党在政策制定方面忽视了柏柏尔地区,导致柏柏尔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渐被边缘化,进而引发了1957—1959年间塔菲拉勒特(Tafilalt)、里夫(Rif)等地大规模的反政府活动。^⑥在里夫动乱中,由于王储哈桑二世对该地区进行了残酷镇压,在其执政的30余年,里夫民众与摩洛哥当局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柏柏尔问题也开始进入政治化阶段。

1961年,哈桑二世继位后,摩洛哥柏柏尔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1961—1970年间的“拉拢”阶段。这一阶段摩洛哥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哈桑二世与以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UNFP)为主的左翼势力进行政治斗争,哈桑二世的核心策略是拉拢柏柏尔地区的军人和贵族,组建皇家武装部队、成立人民运动党(Mouvement Populaire, MP)以抗衡左翼势力;第二,1971—1980年间的“疏远”阶段。1971年和1972年连续两年的未遂军事政变,终结了哈桑二世和柏柏尔贵族之间持续十几年的友好关系。^⑦由于第二次未遂政变主谋穆罕默德·乌夫基尔(Mohamed Oufkir)将军及其他参与者均是柏柏尔人,军队中的其他柏柏尔士兵也遭到了清洗。^⑧从20世纪70年代起,哈桑二世在实施以增强“阿拉伯性”的摩洛哥化运动中也有意减少国家官方文化中的柏柏尔元素,对影响国家稳定的动乱分子采取严厉的武力威逼政策;第三,1981—1990年间以安抚为主的

^① Bruce Maddy-Weitzman, *The Berber Identity Movement and the Challenges to North African Stat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1, pp. 1-5.

^② Jonathan Wyrzten, *Making Morocco: Colonial Inter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57-60; Jonathan Wyrzten, “Performing the Nation in Anti-Colonial Protest in Interwar Morocco”,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9, no. 4 (Summer, 2013), p. 622.

^③ David M. Hart, “The Berber Dahir of 1930 in Colonial Morocco: Then and Now (1930-1996)”,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 no. 2 (Spring, 1997), pp. 11-33.

^④ Bruce Maddy-Weitzman, *The Berber Identity Movement and the Challenges to North African States*, pp. 55-56.

^⑤ Nesem Aslan, *Nation-Building in Turkey and Morocco: Governing Kurdish and Berber Dis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85.

^⑥ Bruce Maddy-Weitzman, *The Berber Identity Movement and the Challenges to North African States*, p. 85.

^⑦ John Waterbury, “The Coup Manque?”, in Ernest Gellner and Charles Micaud (eds.), *Arabs and Berbers: From Tribe to Nation in North Africa*, Lexington, Mass., and London: D. C. Heath/Duckworth, 1972/1973, p. 397.

^⑧ 穆罕默德·乌夫基尔出生于摩洛哥柏柏尔地区塔菲拉勒特省的一个柏柏尔贵族家庭,曾先后担任摩洛哥政府的内政大臣、总参谋长和国防大臣(1972年后哈桑二世取消了国防部)等重要职位。乌夫基尔被处死后,其家庭成员被秘密关押在撒哈拉沙漠的一处监狱。参见 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67.

“吸收”政策(Absorption Policy)阶段。摩洛哥政府将一些敌对的柏柏尔组织拉拢进体制,对其实施软制衡。在20世纪80年代,受邻国阿尔及利亚卡比利亚地区“柏柏尔之春”(Berber Spring)的影响,摩洛哥爆发了波及全国的柏柏尔文化运动。在此形势下,哈桑二世实施了允许以文化为主题的民间社会组织存在、对部分激进活动领袖进行军事威逼的政策。同时,摩洛哥建立了以社团主义和多元主义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从而在整体上避免了阿尔及利亚式^①的武力冲突。^②哈桑二世统治时期,以里夫为主的柏柏尔人聚集区被认为是动乱地区,故而摩洛哥政府的核心目标是政治维稳,较少关注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1999年,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一改哈桑二世时期的政治拉拢与武力威逼政策,转而采用以和解为手段的“总体友好政策”。例如,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初期对摩洛哥里夫地区开展了高调访问,同意由柏柏尔文化运动领袖提出的《柏柏尔宣言》(Berber Manifesto),并批准成立皇家阿马齐格文化研究院(L'Institut Royal de la Culture Amazighe)。在阿拉伯剧变的背景下,穆罕默德六世主持修改宪法,将柏柏尔语列为摩洛哥官方语言之一。^③由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摩洛哥依然占主流,所以王室对柏柏人文化运动的支持也仅局限在政策宣示与口头承诺的层面。

长期以来,摩洛哥政府出台了多项促进里夫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但真正落地的措施少之又少。实际上,摩洛哥政府一直渐进式地推行“去柏柏尔化”运动,如逮捕柏柏尔集会运动领袖、移除街道有关柏柏尔语的名称等。^④作为少数民族的柏柏尔人,其诉求与摩洛哥政府的治理目标在短期内难以调和,因此部分柏柏尔主义者^⑤倾向于通过跨境联盟或者国际化途径向执政当局施压。

二、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国际化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员的跨境流动,基于少数民族的亚民族认同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随着劳工移民的大量产生,以及多元背景移民群体的形成,亚民族认同也变得越来越具有跨国性。就摩洛哥而言,移民潮不仅对国家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持续形塑着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国际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柏柏尔组织开始通过宣传人权理念进入大众视野。^⑥在以欧洲为主的海外地区,摩洛哥柏柏尔流散群体已经成为世界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贡献者。^⑦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实践活动逐渐加深了柏柏尔人的多元身份认同以及对母国的家园情结。总体而言,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国际化的发展与泛柏柏尔主义、国际柏柏尔组织、摩洛哥柏柏尔流散群体和欧洲柏柏尔文化运动四个因素密切相连。

^① 1980年,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因争取文化与语言权利与阿政府爆发冲突,由于冲突持续时间长、影响大,该冲突又被称为“柏柏尔之春”。

^② Bruce Maddy-Weitzman, *The Berber Identity Movement and the Challenges to North African States*, pp. 92 - 101. 高文洋、韩志斌《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缘起与嬗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3期。

^③ Bruce Maddy-Weitzman, “The Amazigh Factor: State-Movement Relations under Mohammed VI”, in Bruce Maddy-Weitzman and Daniel Zisenwine (eds.), *Contemporary Morocco: State,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Mohammed VI*,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112 - 113.

^④ 2004年和2016年,摩洛哥警方曾两次较大规模地抓捕参与纪念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之春”活动和参加摩洛哥胡塞马“人民运动”的柏柏尔人。

^⑤ 柏柏尔主义者是指以追求柏柏尔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活动分子,他们一般通过社会运动的形式实现上述诉求。参见 Bruce Maddy-Weitzman, “Contested Identities: Berber, ‘Berberism’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3, no. 6 (Winter, 2001), pp. 23 - 47.

^⑥ Bruce Maddy-Weitzman, “Berber/Amazigh ‘Memory Work’”, in Bruce Maddy-Weitzman and Daniel Zisenwine (eds.), *Maghreb in the New Century: Identity, Religion and Politic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7, p. 44.

^⑦ Norah Karrouche, “Becoming Berber: Ethnicity and Identity Politics among Moroccans in Belgium”, in Christiane Timmerman, Nadia Fadil, Idesbald Goddeeris, Noel Clycq and Karim Ettourki (eds.), *Moroccan Migration in Belgium: More Than 50 Years of Settlement*,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24.

1. 泛柏柏尔主义在摩洛哥的传播

北非泛柏柏尔主义(Pan-Berberism)思潮的兴起是促进摩洛哥柏柏尔问题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动因。泛柏柏尔主义思潮最早起源于法国,19世纪60年代初定居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在巴黎建立了“柏柏尔学院”(Agraw Imazighen),其后相继有多个柏柏尔组织在巴黎成立,泛柏柏尔思潮逐步形成。定居在法国的摩洛哥柏柏尔人也将这一思潮通过大众传媒、学习交流等形式传到摩洛哥,促生了诸多摩洛哥本土柏柏尔组织的诞生。^①1967年摩洛哥柏柏尔研究与文化交流协会(L'Association Marocaine de Recherche et D'Echanges Culturels, AMREC)在拉巴特成立,1978年“起航社”(al-Intilaqa)^②在北部里夫地区的纳祖尔市成立。^③20世纪90年代,多个摩洛哥柏柏尔组织试图将“塔玛齐格特语”(Tamazight,即柏柏尔语)纳入《联合国人权宣言》,推动柏柏尔问题的国际化进程。最具代表性的组织是总部位于拉巴特的“多玛纳特”(Tamaynut),该组织的成员主要由律师构成,在全国设有30个分支机构。1991年,“多玛纳特”开始向国际社会宣传柏柏尔问题。两年后,“多玛纳特”的领袖哈桑·伊德贝尔卡萨姆(Hassan Idbelkassam)受邀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此后,伊德贝尔卡萨姆一直是促进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权利的国际会议的常客,并且是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成员。2005年,在伊德贝尔卡萨姆的帮助下,柏柏尔主义者建立了“摩洛哥阿马齐格民主党”(Parti Démocratique Amazigh Marocaine)。^④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一直处于初始阶段。^⑤尽管成立了多个致力于维护柏柏尔人权利的非政府组织,但其影响力仅限于国内层面。在这一时期,哈桑二世通过“吸收”和军事威逼的政策已基本控制了柏柏尔运动的上升趋势,海外柏柏尔文化运动尚未引起摩洛哥当局的广泛关注。

2. 国际柏柏尔组织的兴起

国际柏柏尔组织是推动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外部力量。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柏柏尔组织快速兴起。1994年8月,第十七届柏柏尔人电影节在法国西北小城布列塔尼举行,这标志着国际柏柏尔组织从零散状态发展到有组织的阶段。^⑥此次柏柏尔电影节共有来自摩洛哥、法国、西班牙、阿尔及利亚等25个国家的柏柏尔人组织和图阿雷格人组织参与,大会明确了“阿马齐格人运动”的诉求——各国政府须承认柏柏尔人的语言和文化,并将柏柏尔人在北非的聚居地确定为“纵向从西部的加那利群岛延伸至东部的锡瓦绿洲(埃及),横向从北部的地中海拓展至南部的布基纳法索”。^⑦

1995年9月1—3日,世界阿马齐格人大会(Congrès Mondial Amazigh)“预备会议”在法国南部的圣龙德多朗市举行,会议选举阿尔及利亚人法布鲁克·费克尔(Fabruk Fikr)为筹备主席,伊德贝尔卡萨姆、阿卜杜拉希·亚塔尤布(Abdoulahi Attayoub)、乌赞·阿赫赫丹(Ouzzin Aherdane)担任副主席。1997年8月27—30日,经过内部争论、与北非各国政府协调的漫长筹备,世界阿马齐格人大

① Stéphanie Pouessel, *Les Identités Amazighes au Maroc*, Paris: Non Lieu, 2011.

② 1981年,该组织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与稳定而被取缔。整个20世纪80年代,里夫地区都不允许建立柏柏尔文化组织。

③ Norah Karrouche, “Memory as Protest: Mediating Memories of Violence and the Bread Riots in Rif”, in Norman Saadi Nikro, Norman Saadi, and Sonja Hegasy (eds.), *The Social Life of Memory: Violence, Trauma, and Testimony in Lebanon and Morocco*, Berlin: Springer, 2017, pp. 219–220.

④ “摩洛哥阿马齐格民主党”在2008年被政府取缔。参见“La Dissolution du Parti Démocratique Amazigh Marocain (PDAM) le 17 Avril 2008”, *Amazigh World News*, 18 Avril 2008, http://www.amazighworld.org/human_rights/index_show.php?id=1429.

⑤ Moha Ennaji, “The Berber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Maghreb: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ransnationalism”, *The World in Movement*, Leiden: Brill, 2019, pp. 238–251.

⑥⑦ Bruce Maddy-Weitzman, *The Berber Identity Movement and the Challenges to North African States*, p. 133, 134.

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市郊塔菲拉(Tafira)举行,此次会议确定世界阿马齐格人大会为非洲政府间国际组织,独立于所有政府与政党,是一个和平、民主、致力于捍卫人道主义价值的组织,同时抵制极权主义、宗派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意识形态,并对所有运作中的柏柏尔组织开放。^①

从跨境角度来看,世界阿马齐格人大会的成立在地理上联合了“塔玛扎格”(Tamazgha,表示柏柏尔人聚集地)地区包括摩洛哥在内的各主权国家的柏柏尔组织。^②在世界阿马齐格人大会的成立大会上,会议发表宣言,谴责北非各国政府未能执行联合国宣布将1990年定为“国际土著人民国际年”的决议,并要求执行联合国在1994年2月8日宣布的“国际土著人民国际十年”的后续决议。世界阿马齐格人大会成立的目标主要是捍卫柏柏尔人的文化、人权、民主以及法治等个人和集体权利。

作为国际组织的世界阿马齐格人大会,通常被北非国家认为干涉了内政,但不同国家采取了差异化的政策。阿尔及利亚政府在境内的柏柏尔组织参与世界阿马齐格人大会时,采取了诸如控制签证、取缔和打压相关组织等严厉的管控措施,与之相比,摩洛哥政府对世界阿马齐格人大会的举办表示欢迎,采取积极的外交拉拢政策,以服务于国内对柏柏尔人的政策。1997—2020年,该组织共举办了9次一般会议,其中2005年(第四届)、2008年(第五届)和2015年(第七届)均由摩洛哥承办,分别在纳祖尔、梅克内斯^③和阿加迪尔。由此可见,世界阿马齐格人大会的建立与发展不仅仅推动了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国际化的进程,还促使了摩洛哥对柏柏尔问题的国际化实行“柔性管控”的策略。

3. 摩洛哥柏柏尔流散群体的生成

在国际柏柏尔组织快速发展的同时,摩洛哥的柏柏尔流散群体^④也开始推动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国际化的进程。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国际化是一项从国内延展到国际社会的政治化过程,其目的是影响摩洛哥政府的柏柏尔人政策,柏柏尔人海外流散群体网络的形成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在移居国(Host Country)的政策压力下,甚至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摩洛哥柏柏尔流散群体的形成主要受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双重驱动。20世纪60年代初,哈桑二世忙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忽略了经济发展,尤其缺乏对偏远的里夫、阿特拉斯等山区的发展投入,进而拉大了农村柏柏尔无产阶级与城市阿拉伯中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为解决失业、提振经济及消除社会怨恨,哈桑二世积极向欧洲各国输出劳工移民,其中绝大部分为柏柏尔人。^⑤1962—1972年,欧洲经济飞速发展,各国对低技能的劳工需求随之上升,摩洛哥政府相继与西德(1963年)、法国(1963年)、比利时(1964年)和荷兰(1969年)签署了《劳工招聘协议》(Labor

^① 参见世界阿马齐格人大会官方网站介绍: <https://www.congres-mondial-amazigh.org/cma/>

^② Terhi Lehtinen, “The Transnational Nation-State of the Amazigh Cultural Movement: Class, Gender and Marginalization in a Virtual Perspective”, in Nabil Boudraa and Joseph Krause (eds.), *North African Mosaic: A Cultural Reappraisal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 p. 147.

^③ 第五届大会原本计划在阿尔及利亚举行。

^④ 最早意义上的“流散者”(Diaspora)是指离开故土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前者是出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后者来自旧约的《申命书记》。后来,学界倾向于将“流散者”特指历史上离开故土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对古老的以色列国有着集体的记忆,因而有着建立以色列国的共同愿望。2002年,荷兰学者范·阿莫斯福特(Van Amersfoort)指出,“流散者”是指“一群自认为来自其他地方的人组成的定居社区,他们共同和最重要的目标是在被视为‘家园’的地方实现一种政治理想”。据此,本文讨论的柏柏尔流散者正是基于该定义。参见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17-18; Van H. Amersfoort, “The Waxing and Waning of a Diaspora: Moluccans in the Netherlands 1950-200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Social History Association, St Louis, 23-27 October 2002.

^⑤ Laurie A. Brand, *Citizens Abroad: Emigration and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0-21.

Recruitment Agreements)。10年间,摩洛哥在海外移民的总人数增加了10倍,从3万人增至30万人。由于柏柏尔人长期面临摩洛哥政府的政治威逼和经济边缘化的困境,劳工和家庭移民数量一直呈稳步增长的态势,是摩洛哥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以来,摩洛哥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的移民来源国之一,在全球的移民人数已超过400万,移民主要目的地以欧洲、美国和加拿大为主。从移民的偏好地来看,北部里夫地区和南部苏斯地区的柏柏尔人倾向于向法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和德国等国移民。^①目前,柏柏尔人是欧洲北非移民的主要族群之一。据2017年欧洲议会统计,柏柏尔人在欧洲的人数达200余万。^②欧洲地区数量庞大的摩洛哥柏柏尔人成为流散群体,他们与母国的柏柏尔群体有着天然联系,是推动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国际化的中坚力量。

4. 欧洲柏柏尔运动的发展

摩洛哥柏柏尔流散群体的增加直接促进了欧洲的柏柏尔政治与文化运动。摩洛哥柏柏尔运动在欧洲的扩散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导向阶段。这一时期,欧洲的摩洛哥柏柏尔组织大都由里夫夫人创办,以律师、教师、社会工作者和政治难民等柏柏尔精英为主。他们一方面在移居国推动建立柏柏尔组织,另一方面与摩洛哥境内的里夫活动分子保持联系,以促进母国柏柏尔运动的发展。^③在柏柏尔流散群体活动分子的影响和资助下,纳祖尔、胡塞马、得土安等里夫城市建立了多个柏柏尔组织,如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起航社”和“前进社”(Ilal Amam),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钻石社”(Ilmas)、 “复兴社”(Tanukra)、 “塔塞格瓦内斯特社”(Taseghwnest)、 “努米底亚社”(Numidia)、 “努库尔社”(Nukur)。^④其中,“前进社”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治组织,其他均是以人权、民主、自由为主导的政治组织,其目的是建立“政治统一战线”,为柏柏尔人争取相应的权利。同一时期,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的海外柏柏尔组织通过媒体宣传、集会、游说移居国政客等多种途径向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施压,保障和改善柏柏尔人的人权、语言和文化等基本权利。^⑤

第二,20世纪90年代末至2011年的柏柏尔认同塑造阶段。随着欧洲地区第二代柏柏尔移民的成长和兴起,柏柏尔组织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转变,从关注政治、人权等议题发展到以构建新一代移民的柏柏尔认同为主。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柏柏尔组织开展了大量以语言、电影、音乐、美食、历史等主题的文化活动。在比利时佛兰德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文化协会“爱无国界”组织(Vreemd maar Vriend)以举办柏柏尔人的历史、音乐、戏剧和诗歌活动见长,目的是加深第二代移民的族群认同。进入21世纪,里夫的柏柏尔活动分子在佛兰德地区成立了“迪勒利”组织(Tilelli)^⑥,在布鲁塞尔成立了“提法文”组织(Tifawin)和“语巴”组织(Yuba)。^⑦在

^① Berriane Mohamed, “Les nouvelles tendances de la migration marocaine”, in Mohamed Berriane (dir.), *Marocains de l'extérieur* - 2013, Rabat: Observatoire de la Communauté Marocaine Résidant à l'Étranger, 2014.

^② 一些柏柏尔组织甚至声称有400万人,参见Ángela Suárez Collado, “L'activisme de la Diaspora Amazighe en Espagne: Opportunités et Limites pour une Action Continue”, in Mohand Tilmatine and Thierry Desrués (dir.), *Les Revendications Amazigh dans la Tourmente des “Printemps Arabes”*, Rabat: Centre Jacques-Berque, 2017, p. 255.

^③ Ángela Suárez Collado, “L'activisme de la Diaspora Amazighe en Espagne: Opportunités et Limites pour une Action Continue”, in Mohand Tilmatine and Thierry Desrués (dir.), *Les Revendications Amazigh dans la Tourmente des “Printemps Arabes”*, Rabat: Centre Jacques-Berque, 2017, pp. 275 - 277.

^④ Norah Karrouche, “Becoming Berber: Ethnicity and Identity Politics among Moroccans in Belgium”, p. 228.

^⑤ Karrouche, “Becoming Berber: Ethnicity and Identity Politics among Moroccans in Belgium”, p. 229; Hans Van Amersfoort and Anja Van Heelsum, “Moroccan Berber Im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Their Associ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Ties: A Quest for Identity and Recognition”, *Immigration and Minorities*, vol. 25, no. 3 (Spring, 2007), p. 247.

^⑥ “迪勒利”先前的名字是“乌玛斯”(Umas),在柏柏尔语的里夫方言中是“小兄弟”的意思。

^⑦ Norah Karrouche, “Becoming Berber: Ethnicity and Identity Politics Among Moroccans in Belgium”, pp. 230 - 232.

荷兰,最早的柏柏尔组织有阿姆斯特丹的“伊扎乌兰”组织(Izaouran)、乌得勒支的“塞法克斯”(Syphax)、提耳堡的“阿德拉尔”组织(Adrar)。^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荷兰还是在比利时,该时期的柏柏尔流散活动分子大多来自里夫地区,少量来自苏斯地区,所以塑造的柏柏尔认同在更大程度上可被称作“里夫认同”。

跨界族群的国际化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柏柏尔问题只是摩洛哥的内政问题。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受全球经济,尤其是地中海南北岸经济互动的影响,跨境交流变得愈发频繁,泛柏柏尔主义、国际柏柏尔组织、柏柏尔流散群体和欧洲柏柏尔运动相继出现。这些因素既是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国际化发展的体现,又是内在的推动力。

三、“2·20”运动后柏柏尔问题国际化的新动态

2010年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后,“阿拉伯之春”运动迅速扩散至中东的其他阿拉伯国家。2012年,受此影响,摩洛哥爆发了“2·20”运动,伊斯兰主义者和包括柏柏尔人在内的边缘群体成为此次社会运动的主力军。在此后的政治改革中,虽然柏柏尔人权利在修订后的宪法中得到了体现,但由于中东和萨赫勒地区的持续动乱,以及摩洛哥国内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2012—2020年期间,柏柏尔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反而产生了诸多新问题。

1. 柏柏尔人“独立运动”思潮在北非地区蔓延

历史上,北非地区曾多次爆发柏柏尔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每一次冲突都会催生柏柏尔人独立思潮。殖民时期,为抵抗西班牙的残酷统治,里夫地区的柏柏尔人领袖阿卜杜拉·卡里姆·哈塔比(Abdelkrim El Khattabi)发动了著名的“里夫战争”(Rif War),并在1921年建立了里夫共和国,成为近代以来第一个独立的“柏柏尔国”。^②此后,北非地区多次发生柏柏尔人起义。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地区曾于1980年和2001年^③爆发了大规模动乱。阿拉伯剧变后,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被推翻,一方面导致内战不断,另一方面间接引发了2012年的马里战争。在统治末期,为应对反政府武装势力,卡扎菲招募了大量柏柏尔人的分支图阿雷格人。利比亚内战爆发后,数千名图阿雷格战士带着在利比亚军队崩溃时获得的武器进入马里北部。随着势头的增强,他们得到了来自马里军队的图阿雷格叛逃者的进一步支持,最终占据上风,促成了2012年3月21日至22日的军事政变,推翻了马里民选文职领导人。^④

2012年4月,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pour la Liberation de l'Azawad)在马里北部基达尔、加奥、通布图等地区建立了独立的“国家”——“阿扎瓦德国”。虽然“阿扎瓦德国”存活了不到两个月,且未获得任何国家的承认,但它可被称作“里夫共和国模式”的再现。从本质上讲,“阿扎瓦德国”的建立是一次柏柏尔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旨在通过革命手段建立柏柏尔人的国家。作为北非地区重要的柏柏尔人居住地,摩洛哥虽与马里不接壤,但这一运动点燃了摩洛哥境内柏柏尔人^⑤构建跨境族群认同的文化浪潮。摩洛哥王室为应对马里危机带来的潜在威

^① Hans Van Amersfoort and Anja Van Heelsum, “Moroccan Berber Im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Their Associ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Ties: A Quest for Identity and Recognition” *Immigration and Minorities*, vol. 25, no. 3 (October, 2007), pp. 247–253.

^② C. Richard Pennell, “How and Why to Remember the Rif War (192–2021)”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2, no. 5 (August, 2017), pp. 798–820.

^③ 阿尔及利亚在1980年和2001年分别爆发了“柏柏尔之春”和“黑色柏柏尔”运动。

^④ Yehudit Ronen, “Libya, the Tuareg and Mali on the Eve of the ‘Arab Spring’ and in Its Aftermath: An Anatomy of Changed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8, no. 4 (June, 2013), pp. 544–559.

^⑤ 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西撒哈拉地区的萨拉维人。

胁,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如支持法国在安理会提出的出兵马里的提议、培训马里境内的伊玛目等。2014年2月1日,穆罕默德六世在马拉喀什王宫会见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比拉尔·切里夫(Bilal Cherif),此举可以视为国王在外交上的帮扶政策,即帮助马里政府“拉拢”阿扎瓦德民族解组织,维护其领土完整,防止“独立运动”的扩散。^①2020年8月,马里发生政变,该国北部图阿雷格地区的动乱局势再次助推了柏柏尔独立思潮的蔓延。

2. 摩洛哥北部里夫地区的动乱引域外国家频繁介入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问题一直是西方国家干预他国内政的借口。萨勒赫地区的图阿雷格民族独立运动失败之后,北非地区的柏柏尔人社会运动开始进入高发期。2012—2020年,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境内柏柏尔人的各种抗议活动持续不断。2016年10月底,摩洛哥北部胡塞马省一位叫穆辛·菲克里(Mouhcine Fikri)的渔民与警方发生冲突后意外死亡,该地区随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众示威游行,此次运动被称为“人民运动”(Hirak Movement),一直持续到2017年2月,运动的目的是抗议政府腐败和长期以来对里夫地区的忽视与边缘化政策。2017年3月29日,摩洛哥政府采取强力措施,逮捕了“人民运动”的领袖纳赛尔·泽夫扎菲(Nasser Zefzafi)和数百名参与者。此后,摩洛哥政府在胡塞马地区布置了大量警力,以稳定局势。^②2018年6月,在泽夫扎菲被捕一年后,摩洛哥法院以其涉嫌从事“分离主义”运动判处有期徒刑20年,拉巴特、卡萨布兰卡等大城市随即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2020年1月,柏柏尔活动分子在摩洛哥成立了“政治运动阵线”(Front d'Action Politique),旨在扩大柏柏尔运动的政治参与和公开辩论的空间。^③

在国际社会上,摩洛哥政府处理里夫“人民运动”的方式招致大量的批评与指责。首先是里夫地区的柏柏尔流散群体,他们通过向移居国施压、网络宣传、在国际场合抗议等形式表达对摩洛哥政府武力威逼政策的不满。^④第二,欧洲国家的施压。在柏柏尔流散组织的游说下,欧盟多次表示对摩洛哥政府处理“人民运动”问题的担忧,尤其是在人权方面。2017年6月和2018年9月,摩洛哥和荷兰发生了两次外交危机,均是因荷兰外交部外长公开谴责摩洛哥政府逮捕“人民运动”的活动分子而引发的。^⑤同时,欧盟也意识到摩洛哥政府对里夫地区的武力威逼政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非法移民。^⑥欧洲的摩洛哥籍恐怖分子大部分来自里夫地区,因而这也成为欧洲关注此次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⑦最后,国际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在“人民运动”爆发后,对摩政府逮捕活动分子行为也给予了严厉谴责。虽然摩洛哥政府常以“干涉内政”的名义抗议欧洲国家的指责,但在与欧盟进行贸易谈判时,人权问题已经成为摩洛哥外交难以回避的议题。

^① Vish Sakhivel, “Morocco’s Move in Mali: What Rabat Gained in the Battle Against Islamic Extremism”,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4, 201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frica/2014-01-14/morocco-move-mali>

^② “Maroc: Mieux comprendre le Mouvement de Contestation d’Al-Hoceima”, *Le Monde*, 20 Juin 2017, https://www.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17/06/20/maroc-mieux-comprendre-le-mouvement-de-contestation-d-al-hoceima_5148196_3212.html

^③ “Mobilisation - Le Mouvement Amazigh se Dote d’une Plateforme Baptisée le ? Front d’Action Politique ?”, *Article 19*, <http://article19.ma/accueil/archives/122692>.

^④ 参见世界阿马齐格人网站: <http://amazighworldnews.com/category/diaspora/>

^⑤ Luigi Lonardo, “Political Turmoil in Morocco Spills Over into Tensions with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Politics and Policy*, June 27 2017, <http://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7/06/27/political-turmoil-in-morocco-tensions-with-the-netherlands/>; Chakir Alaoui, “Rabat Convoque L’Ambassadeur des Pays-Bas”, *Le 360*, Septembre 7, 2018, <http://fr.le360.ma/politique/rabat-convoque-lambassadeur-des-pays-bas-173974>

^⑥ Saeed Kamali Dehghan, “Au Maroc, la Répression du Hirak Provoque un Nouvel Exode de Migrants Vers l’Espagne”, *Le Monde*, Novembre 2, 2017, https://www.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17/11/02/au-maroc-la-repression-du-hirak-provoque-un-nouvel-exode-de-migrants-vers-l-espagne_5209309_3212.html

^⑦ Leela Jacinto, “Morocco’s Outlaw Country is the Heartland of Global Terrorism”, *Foreign Policy*, 2016,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04/07/the-rif-connection-belgium-brussels-morocco-abdeslam/>

3. 柏柏尔人与犹太人合作的趋势愈发明显

在北非的历史、神话和传说中,柏柏尔人和犹太人常被描述成具有天然的友好关系。第一种说法是部分柏柏尔人起源于犹太人;第二种说法是犹太人和柏柏尔人同是北非地区的古老民族,曾共同抵抗过阿拉伯人的武力征服;第三种说法是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柏柏尔人和犹太人世代和睦相处。^①现代阿拉伯学者对上述说法持怀疑态度,但大多学者认为双方在历史上曾一起紧密生活过,犹太人常常作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联系人。据1936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161942名摩洛哥犹太人中有95662人是柏柏尔语和希伯来语双语者,有24462人只讲柏柏尔语。^②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以色列问题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敏感性,柏柏尔运动很少会与犹太人联系起来。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摩洛哥境内出现了两种相对立的社会运动:亲犹太主义的柏柏尔运动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伊斯兰主义运动。^③近年来,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过度关注,却忽视了偏远地区人民的教育、就业等基本问题,这在柏柏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反感。^④他们转而以支持犹太人的方式,表达对摩洛哥社会过度关注巴勒斯坦问题的不满。2007年摩洛哥南部苏斯地区的柏柏尔人成立了“柏柏尔—犹太人友好协会”,2008年胡塞马地区成立了“集体记忆协会”(Memoire Collective),这些协会的共同目标是建立反“反犹太主义”阵线。^⑤2011年摩政府在新宪法中承认了犹太文明作为摩洛哥多元文明的一部分,这进一步为柏柏尔运动支持犹太人提供了法理基础。2014年6月,摩洛哥柏柏尔人成立了一个名为“打击反犹太主义摩洛哥观察机构”的组织,其目的是回应2013年摩洛哥5个政党联名向议会提议将摩以贸易关系定为非法的举动。^⑥因此,柏柏尔人与犹太人的联合将成为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国际化的新特征。

2020年初以来,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国际化还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月,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席卷摩洛哥,截至10月底,摩洛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988例,累计超20万例,^⑦经济社会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尽管摩洛哥柏柏尔地区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影响较小,但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受损,摩政府在该地区的发展投入势必会大大降低,让原本脆弱的边缘地区再次陷入发展困境。^⑧发展问题将是未来柏柏尔运动从文化议题转向政治议题、并持续国际化的重要内因。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疫情将是未来摩洛哥政府治理少数民族外溢化现象的重要挑战。

四、结 语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社会运动的国际化是一国治理民族问题面临的新课题,也是难题

^① Bruce Maddy-Weitzman, *The Berber Identity Movement and the Challenges to North African States*, pp. 146 - 147.

^② Harvey E. Goldberg, "The Mellahs of Southern Morocco: Report of a Survey", *The Maghreb Review*, vol. 8, no. 3 - 4 (May, 1983), pp. 61 - 69.

^③ Paul A. Silverstein, "A New Morocco? Amazigh Activism, Political Pluralism and Anti-Semitism",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18, no. 2 (Spring/Summer, 2012), p. 135.

^④ Samir Ben-Layashi, "Secularism in Moroccan Amazigh Discours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2, (June, 2007), pp. 153 - 171; Aomar Boum, "Berber Rida: Amazighism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Jewish Discourse", 13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Western Jewish Studies Association,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March 18 - 19, 2007; Bruce Maddy-Weitzman, "Morocco's Berbers and Israel", *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 (January, 2011), pp. 79 - 85.

^⑤ Bruce Maddy-Weitzman, "Morocco's Berbers and Israel", *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 18 January 2011, pp. 79 - 85.

^⑥ "Moroccan Berbers Set Up Anti-Semitism Watchdog", *Times of Israel*, 7 June 201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moroccan-berbers-set-up-anti-semitism-watchdog/>

^⑦ 《摩洛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988例,累计超20万例》,新华网,2020年10月28日, http://www.xinhuanet.com/yingjijuyuan/2020-10/28/c_1210861200.htm

^⑧ Chafik Bakour et Sara Ouassou, "Les Politiques Sociales en Contexte du COVID-19: INDH 'Le Programme d'Amélioration du Revenu et Inclusion Economique des Jeunes'", *Revue Internationale du Chercheur*, vol. 1, no. 2 (2020), pp. 389 - 407.

之一。在以伊斯兰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北非国家摩洛哥,以追求语言和文化权利为核心目标的柏柏尔运动,越来越具有世俗化的倾向,其目的是抵抗主流的阿拉伯—伊斯兰意识形态。因为在柏柏尔人看来,独立以来的摩洛哥伊斯兰化始终伴随着阿拉伯化的过程,严重地损坏了摩洛哥文化中的阿马齐格特性。在这一难以调和的宗教—世俗二元矛盾下,摩洛哥柏柏尔人开始“走出去”,寻求跨境亚民族认同,以实现想象中的“柏柏尔语言与文化共同体”。

当国际化现象业已形成时,这种超越主权国家的群体力量开始对少数民族所在国产生影响。从积极角度来看,可以促进国内社会运动的开展,促使政府关注少数群体,加强社会凝聚力;从消极角度来看,境外组织的活动也易滋生分离主义,甚至恐怖主义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摩洛哥的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发展离不开来自欧洲等国的国际柏柏尔组织的帮助,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的柏柏尔分离主义的言论与思潮也深刻地影响摩洛哥国内的柏柏尔人,进而导致国家或地区的不稳定。对此,摩洛哥政府采取了积极介入与吸收政策的“柔性管控”策略,以减少柏柏尔问题国际化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柔性管控”,一方面是要保护和支 持温和民间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时刻提防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出现。所以,在未来,如何应对国内外柏柏尔运动和组织的发 展,对摩洛哥来说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国际化现象及治理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理类似的敏感问题,亦有启示意义。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domestic ethnic minority issu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national political governance. The Berber issue in Morocco originated from the policy of “divide and rule” practiced during the French colonial period. After Morocco’s independence, affected by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Berber issue was gradually politicized. In the 1970s, the Berber issue, as an internal issue of Morocco, began to take an international turn. Since the 1990s, under the joint promotion of the Pan-Berberism, international Berber organizations, the Berber diasporas and the European Berber movement, the Berber issue in Morocco has been gradually internationalized.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February 20 movement in 2011,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Berber movement in Morocco gave rise to secessionism, terrorism and other factors that have led to regional instability. For this, the Moroccan government adopted a “flexible control” strategy highlighting active intervention and absorp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Berber issue.

(张玉友, 博士后,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西安, 710069)

(责任编辑: 于红)